

# 谢元淮的人生行旅

## 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九·官桥村

□ 叶继程

松滋，这座位于江汉平原西缘、长江南岸的小城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显赫，却在清代中叶悄然孕育出一位横跨盐政、文学、音韵与方志的复合型人物——谢元淮。他的一生，如同一条自武陵山深处流出的溪水，穿过江汉平原，汇入江淮的波涛，最终又在浩瀚的典籍海洋中，留下一行深深的印痕。

谢元淮出生在湖北松滋杨林市镇官桥村，此地背靠武陵山余脉，面朝长江支流，既得山川之气，又受江湖之风。荆楚之地，向有“惟楚有才”的美誉，自屈原、宋玉以来，骚人墨客辈出。松滋虽非通都大邑，却也文风渐盛。谢氏一族，本是耕读之家，谢元淮自幼便在门前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的田园书中成长。

童年的谢元淮，常随长辈在田间劳作。春秋秋收之间，他捧着书，在田埂上诵读诗文，稻浪翻滚，仿佛与书页上的平仄相互应和。夏夜的庭院里，油灯昏黄，他伏在案前，手不释卷。荆楚多雨，窗外雨声淅沥，屋内读书声不绝，这是他最早的“诗境”。武陵山的苍劲，荆江的浩荡，谢家屋场的晨曦，台山坡的古槐，在他的记忆中沉淀，成为日后笔下的意象。后来，他在《养默山房诗稿》中写下无数吟咏山水的诗篇，其中不少意象，都能在松滋的山川风物中找到原型。

谢元淮的仕途，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路径并无二致：读书、应试、入仕。然而，他真正的人生转折，却发生在远离家乡的江淮大地。清代的盐政，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。尤其是两淮盐区，一向以富庶著称，却也因官商勾结、层层盘剥而弊端丛生。传统的“纲盐”制度，由少数官商垄断，盐价高昂，百姓负担沉重，而国库收入却未必相应增长。

道光年间，谢元淮受命参与两淮盐政。他深入盐场，实地考察，目睹了盐民的艰辛与盐商的暴利，也看到了制度的积弊。他在《淮盐差改票本末》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：从“纲盐”到“票盐”的转变，并非一纸政令就能完成，而是一场牵动多方利益的艰难博弈。所谓“票盐”，就是打破官商垄断，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人凭票运销食盐。这一制度看似简单，却意味着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直接冲击。

谢元淮在其中扮演的，是制度设计与推动者的角色。他既要说服朝廷，又要安抚旧商，更要保障盐民与百姓的利益。在他的推动下，两淮票盐制度逐步推行。结果令人震惊：国库岁入大增，而百姓的盐价却明显下降。据史料记载，楚地百姓每年可因此节省盐钱千四百万贯之巨。这一数字背后，是无数普通家庭得以减轻的生活负担，也是谢元淮作为经世之臣的政绩所在。

然而，改革从来不是一片坦途。谢元淮在《淮盐差改票本末》中，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，记录了改革过程中的争论、阻力与妥协。他并非不知官场险恶，却仍选择站在国家与百姓的一边。这种选择，使他在清代盐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经世致用的底色。

在盐政改革的喧嚣之外，谢元淮还有一个更为静谧的世界——养默山房。这是他给自己书斋起的名字。“养默”二字，既有道家“守静”之意，也有儒家“慎言”之旨。在这里，他褪去官员的身份，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、诗人与词人。

《养默山房诗稿》四十卷，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巨册。这些诗作，既有对江汉平原与江淮大地的描绘，也有对仕途沉浮的感慨，更有对民生疾苦的关切。他的诗，不尚雕琢，却真挚深沉。读他的诗，仿佛能看到一位行走在田埂、盐场与书斋之间的士人，用脚步丈量土地，用笔墨记录时代。

《养默山房诗馀》二卷，则是他的词集。词本是宴乐之曲，发展到清代，已成为文人抒情的主要载体。谢元淮的词，既有婉约之致，也有豪放之风。他写山水，清新自然；写身世，苍凉深沉；写民生，质朴真切。在他的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世之臣的柔情与担当。

除了诗词创作，谢元淮还对词的音乐性与格律有着深入研究。《碎金词谱》《碎金续谱》《碎金词韵》《词镜》《填词浅说》等著作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词学体系。他不仅自己填

词，更希望后人能够在清晰的格律与音韵规范中创作。这种对规范的重视，与其在盐政改革中对制度的重视，有着内在的一致性。

在《碎金词谱》中，他收录了五百余首唐宋以来的经典词作，并配以工尺谱，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文字中的作品，重新与音乐连接。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，却极具学术与艺术价值。对于后世研究中国古典词曲的音乐形态，《碎金词谱》是绕不开的重要文献。

谢元淮不仅是诗人、词人，更是一位严谨的音韵学家。他的《碎金词谱》《养默山房诗韵》《诗韵音》等著作，对传统诗韵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审订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，音韵是诗歌的骨架。自《切韵》《广韵》以来，音韵学一直是文人的必修课。谢元淮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，对诗韵进行了细致的审音与分类。他不仅关注平仄、押韵的规范，更强调语音的实际变化，力求在规范与实际之间找到平衡。

《诗韵音》一书，体现了他对语音细微差别的敏感。他通过大量实例，辨析同韵字之间的细微差别，纠正了前人韵书中的一些讹误。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，使他的音韵学著作在清代学界具有重要地位。对于一位活跃在盐政一线官员而言，能够在公务之余，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研究音韵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持。这背后，是他对语言、对诗歌、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。

除了盐政与文学，谢元淮还在方志与边地记述方面留下了重要成果。他总修的《云台新志》，是清代山志中的代表作之一。云台，即今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一带。这里山奇水秀，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。谢元淮在主持修志时，不仅记录了云台的山川形胜、名胜古迹，还对当地的历史沿革、风俗民情进行了系统梳理。他的《云台新志》，体例严谨，资料翔实，兼具史学价值，又有文学色彩。

在《苗中杂诗》中，他记录自己在西南苗区的见闻。那里的山川、风俗、民族关系，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生动呈现。这些诗作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，更是研究清代边地社会的重要史料。《鸢园咏物绝句》则展现了他细腻的观察力与对自然万物的怜爱。他以绝句的形式，吟咏园中各种景物，从一花一木到一鸟一虫，无不栩栩如生。这些小诗，看似轻松，却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敏感。

谢元淮的经世之学，并不止于盐政。他在《防海赘言》中，对清代海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海防问题日益凸显。谢元淮敏锐地意识到，传统的海防观念已经难以应对新的挑战。在《防海赘言》中，他既肯定了前人海防建设的经验，又指出了其中的不足。他主张加强沿海防御体系的建设，重视新式武器的引进与仿制，同时强调海防与江防、陆防的协同。虽然他的建议在当时并未完全实现，但其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与开放视野，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在货币与金融方面，他撰写了《钞法》《钞说》《铸钱以仰洋论》等文章。这些作品，涉及纸币发行、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应对西方货币冲击等问题。虽然他的观点带有时代局限，但在清代中期的语境下，已经显示出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。这些看似零散的“杂著”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世体系：从盐政到海防，从货币到地方货币冲击等问题。谢元淮始终试图用自己的学识与经验，为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寻找出路。

在谢元淮的众多著作中，《迷祖德诗》是一部颇具情感分量的作品。这部诗集，以怀念祖先、追述祖德为主题，体现了他对家族与乡土的深厚情感。松滋官桥村的谢氏家族，并非显赫世家，却有耕读传家的传统。谢元淮在诗中，不仅歌颂祖先的德行，也反思自己的责任。他深知，个人的成就，离不开家族的养育与乡土的滋养。这种对根的珍视，使他在仕途与学术的道路上，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谦卑。

在《买愁集》中，他将自己的忧愁与思考付诸笔端。这里的“愁”，既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慨，也有对国家命运的忧虑。他不是那种只会吟风弄月的文人，而是一位真正将

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士人。

“谁终将声震人间，必先长久深思默想”（尼采）。时光流转，谢元淮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淹没在浩瀚的清代史料之中。直到近代，随着盐政史、词学、音韵学研究的深入，他的著作才逐渐被学界重新发现。《碎金词谱》因其独特的音乐文献价值，被音乐史家与词学家反复引用；《淮盐差改票本末》则成为研究清代盐政改革的必读之书；《养默山房诗稿》与《诗馀》，为研究清代中期诗歌与词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；《云台新志》《苗中杂诗》等，则为地域文化与边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在松滋，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乡贤。乙巳岁末，我来到松滋，采访了作家曹其华先生。曹老师说：松滋文化馆原音乐老师雷鸣华穷其一生，研究谢元淮。21世纪20年代初，雷鸣华去世时，他的后人拟将其父数十万研究草稿付之一炬，时任县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的曹其华因职责所在，抢救性地抢救雷鸣华的文稿存放在当地文化馆档案室。曹先生抱歉地一笑，快人快语：“今天周末，文化馆放假，恐怕难以见到雷老先生留下的草稿了。”因急着探访谢元淮故居，谢绝了曹先生小酌的提议，我们一行人匆匆前往官桥村。

官桥村与湖南澧县交界，潺潺流淌的界溪河界分湘鄂。他的故居、他的墓地、他的诗文，成为杨林市官桥村浓墨重彩的文化记忆。史料记载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谢元淮出生在官桥村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谢元淮因病乞归，回官桥村养老。《松滋县志》载，谢“归乡十余载，视听不衰，时披简册，训迪子孙”，同治六年（1867）病卒，享年83岁。一说葬于台山坡，一说葬于望景岗，待考。

谢元淮故居遗址坐西朝东，顺应日出东方的自然节律，吸纳朝阳之气，体现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居住理念；南望台台北界溪河，背山面水，藏风聚气，既得山水之胜，又具风水上的“依山傍水”吉相；门前一条南北走向的盐茶古道，便于商贸往来。岁月更迭，世事沧桑，眼前的古居，仅残存半片山墙和一不规则墙角。墙体基脚虽存，却隐没在丛生的杂草中，荒芜且寂寥。故居前一月牙形“谢家大堰”，为后世清淤而成。据文友介绍，村民邓贵平收藏了谢元淮故居的两个方石构件等物件。无宗无墓，天色昏暗，我们一行三人，没敢贸然打扰这位素未谋面的有心人，便匆匆驱车踏上归程。

翌日，联系了松滋市作协周晓胜先生，索得邓贵平的电话号码，然后电话采访了他。邓贵平告诉我：“除了曹主席说的雷鸣华，官桥村还有一位名叫范计华的律师穷一生之力，研究谢元淮。20世纪90年代去世后，其准备出专著的手稿，也不知散佚何处。”电话中，他似乎有点无奈，叹息了一声。

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，谢元淮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，更是一张镜子，映照出中国传统士大夫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与实践。谢元淮的一生，跨越了嘉、道、咸、同四朝，见证了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。

他在盐政改革中展现出的魄力与智慧，在诗词创作中流露出的深情与思考，在音韵与方志中体现出的严谨与热爱，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。

他不是那些在教科书中被反复提及的“大人物”，却恪尽职守，以实际行动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；他也不是那种“惊才绝艳”的天才诗人，却用朴实而真挚的文字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貌。今天，当我们翻开《养默山房诗稿》《碎金词谱》《淮盐差改票本末》，仿佛仍能看到那位从松滋走出的士人，在江汉平原的田间、江淮的盐场、云台的山中，默默行走，静静思考。

他的身影，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但他的文字，却在时间的长河中，继续发出微弱而坚定的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谢元淮并未远去。他仍活在他那些被他精心整理的词谱与诗韵中，活在他那些记录改革与民生的奏章与杂著里，活在松滋的山川与江汉平原的风里。只要有人愿意翻开这些书页，他的故事，就会被重新讲述，他的精神，就会在新的时代，得到新的理解与回应。

### 年味荆州

当荆州古城的风开始裹挟着腊味的醇香，当街巷深处传来制作鱼糕的笃笃声，我们知道，年的脚步近了。荆州，这座承载着千年楚文化的城市，在岁末年初之际，总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将“年”这一概念，具象化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。

### 开栏语

“年味荆州”栏目，就是通过捕捉这些时光中流转的瞬间，带您走进寻常巷陌，探寻那些藏在腊肉、圆子、八宝饭里的味觉记忆；我们将翻开泛黄的家谱，讲述祭灶、扫尘、守岁背后的文化密码；我们将聆听老一辈人的口述，记录那些正在消逝的民俗仪式。这不仅是一次对美食、民俗的巡礼，更是一场关于故乡、关于传承、关于“我们从哪里来”的深情回望。

愿这一缕缕从文字中飘散出的年味，能温暖您的寒冬，唤醒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

岁暮天寒，又是一年腊月时。当荆州的街头巷尾，弥漫起谷物与干果在文火的慢炖中交融的甜暖气息时，便告诉我们，腊八节就要到了。大寒时节，捧着一碗热气氤氲、用料丰盈由人的腊八粥，那醇厚绵密的滋味，在舌尖慢慢化开之时，思绪却常常飘向历史的深处。看似一碗寻常的粥，究竟沉淀着怎样厚重的时光与复杂的文化记忆？其实，一碗腊八粥，早已超越了果腹的范畴，成为一个微缩的文明容器。这份文化的珍贵，不仅在于悠久的历史叠影与多元的文化源流，更在于以一种极为可亲可感的方式，将家族的记忆、地域的风俗乃至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紧密相连，并在代代相传中守护共同的精神原乡。

## 腊八节的文化叠影与传承密码

□ 张卫平

“明日一杯何处酒，过江同吃是佛粥。”明代袁宏道的诗句告诉我们，腊八、腊八粥与佛教之间的关联。当年，公安三袁兄弟，常在腊八这天相约从湖陵堤过江到江陵，去寺庙里吃“佛粥”，过腊八。吃“佛粥”的源起，与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传说紧密相连。传说，苦行已久的释迦牟尼，因牧羊女在腊月初八，端来一碗大米奶粥，解了他的饥饿困境，从而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。后世佛门，便于每年腊月初八举行浴佛活动，施粥扬义，以纪念他。据此，有学者认为，腊八节吃腊八粥之俗，是同佛教一起传入我国的。

于是，“腊八”便成为佛教重要的“成道节”。这一传奇故事，充满了慈悲与感恩的宗教温情，为腊八注入了神圣的光彩。唐代诗人杜甫《腊日》诗中宫廷节庆的描绘，宋代诗人欧阳修与陆游笔下民间食粥习俗的记述，无不与这一背景相关。

不过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佛教传入之前的华夏腹地，一条更为古老、根系深植于本土农耕文明的脉络清晰可见。腊八节的风俗，在我国由来已久，最初是为了祭祀祖先、祈求丰收和吉祥安康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“天子大蜡八”的记载，揭开了上古“腊祭”的序幕。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·祀典》里，追溯得更为清晰：“礼传曰，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汉改称为腊。腊者，猎也，言田猎取禽兽，以祭祀其先祖也。”可见，“腊”之本义，乃是岁末丰收后，以猎获禽兽合祭先祖与百神，以酬谢护佑、祈愿来年。后来，楚人对“大蜡”进行了改造，注入了楚文化的因子。《湖北民俗志》里说，起初“古代行腊祭并无固定日期”，荆楚地区在“南北朝时，腊日为阴历十二月初八日，阴历十二月俗称‘腊月’，故为‘腊八节’”。总之，以“报本反始、慎终追远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，与自然敬畏的仪式，构成了腊八的原始内核。《荆楚岁时记》里说，荆楚于腊月初八“击细腰鼓，戴胡头，作金刚力士以逐疫”。这热烈朴野的民间傩仪，正是上古巫风驱疫、渴求康宁愿望的鲜活遗存，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性格。

腊八节，作为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，面对着两套并行乃至交织的节日叙事，一是源于超越性的信仰启迪，一是生于土地呼吸般的生存实践。由此成为两种伟大传统相遇、对话与融合的绝佳文化场域。佛教的“成道日”，并非偶然选择华夏固有的“腊日”，这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调适与“中国化”的实践。外来的宗教节日，借助本土已有的时间框架与祭祀传统，得以更顺利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；而古老的腊祭，也因吸收了佛教慈悲普度的思想与施粥济困的实践，丰富了其文化内涵，强化了社群凝聚力。一碗粥，从寺院的斋食，走向千家万户的灶台，完成了从宗教圣物，到全民民俗符号的创造性转化。这，正是文化传承中“嫁接”与“新生”的生动体现。

仔细观察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腊八粥形态的演变，是一部更细腻的文化传承史，其间闪烁着非常鲜明的楚地智慧。腊八粥的早期形态，是与“驱疫”观念紧密相连的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有楚地传说：“共工氏有不才子，以冬至日死，为疫鬼，畏赤小豆，故冬至作豆粥以禳之。”显然，南朝时的荆州别驾宗懔记述的这个民间传说，说清了腊八粥的源头。

远古时期，水神共工有个儿子作恶多端，死后还变成疫鬼残害百姓，但这疫鬼却非常怕赤豆。于是，楚人便用吃赤豆粥来驱避瘟鬼。这种以特定食物赤豆来驱避邪祟的思维，是原始巫术与早期医药观念的融合。赤豆（赤小豆），因其色赤，被视为具神秘灵力。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说能“下水肿，排痈肿散血”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也充分肯定了药用价值。于是，大米与赤豆熬制的“赤豆粥”，便成为楚地先民岁末驱疫保健的“良药”。宋代《岁时杂记》亦印证：“以赤小豆煮粥，合门食之，可免疫。”楚人食用豆粥的传统习俗，还可以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文“熬菹（豆）一筒”得到印证。

只是，在历史的演变中，单一的“赤豆粥”，逐渐发展成为“六宝粥”“七宝粥”“八宝粥”，甚至十几宝。如清人富察敦崇的《燕京岁时记》对腊八粥用料的记载：“用黄米、白米、江米、小米、菱角米、栗子、红豇豆、去皮枣泥等，合水煮熟，外用染红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、榛穰、松子及白糖、红糖、琐琐葡萄，以作点染。”这份精细与丰盛，折射出习俗在都市文化中的演变与升华，也让这一碗粥，承载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文化符号意义。

也许，今日荆州小吃“元豆泡糯米”，那绵软的豆汤与饱满糯米的交融风味，正是古老“赤豆粥”在千年时空中的一道美味遗存。从祛疫的“赤豆粥”，到融汇南北干果蜜饯的“八宝粥”，再到清末荆州御厨创制的“散烩八宝饭”，用料由简至繁、风味不断丰富的历程，本身就是文化传承中吸纳、创新与精致化的过程。清光绪《荆州府志》所载“寺院以豆果杂米为糜，供而食，曰腊八粥”，正是这种融合状态的地方写照。

腊八节的珍贵，远远超出一碗粥的滋味。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，一套贯穿岁末的生活仪式与情感实践。荆楚之地，素有腊八腌肉、酿腊酒、贮腊水之俗。这些活动，与食粥一样，都是“逐疫迎春”核心主题的物质延伸与时间注脚。腊月一到，大寒踵至，阴极阳生，万物在酷寒中萌动新机，腊八恰如“春节”这部宏大乐章的序曲。北宋诗人苏轼《荆州十首》中的“残腊多风雪，荆人重岁时”与“爆竹惊邻鬼，驱傩逐小儿”的诗句，定格了彼时荆楚风俗的热烈场面，那傩仪中的呼号鼓点，是与上古先民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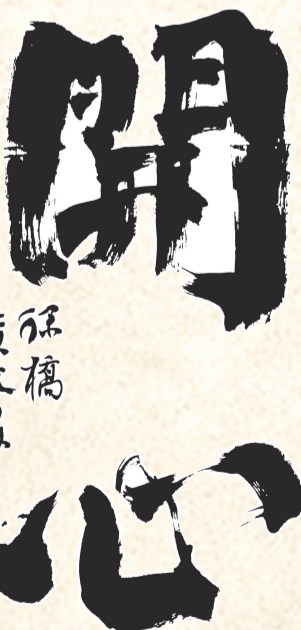
粥香年年依旧，而文化的记忆、家族的温情与民族的认同，就在这袅袅热气与共享的仪式中，代代相传，永续不绝。或许正是腊八节穿越千年，赠予我们最深沉、最温暖的启示与力量。守护这一碗粥的温情与传统，便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为我们漂泊的心灵锚定一处宁静的港湾，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留存一份鲜活的样本，更是守护那个让中华民族在时光长河中始终保持辨识度与凝聚力的“精神原乡”。

# 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二期 总第一百九十三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### 翰墨荆楚 52



开心  
作者 黄文泉